

论古尔纳《来世》中伊利亚斯的族裔身份操演及伦理选择

费春梅

中国矿业大学

DOI:10.12238/er.v8i10.6464

[摘要]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历史小说《来世》描绘了20世纪初中期英德殖民时期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地区普通民众的艰难生存境遇。该研究聚焦于小说隐性中心人物伊利亚斯在“德国文明使命”号召下自我殖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探讨他在德国文化殖民影响下抛弃家人参加非洲雇佣军及移民德国的他者认同过程，揭示伊利亚斯族裔身份的操演性，以及他作为“缺席的在场”在去中心化故事链条中的象征意义，突显殖民历史和地缘政治对个人伦理选择的影响以及对德国在非洲文化殖民主义策略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 古尔纳；伊利亚斯；族裔身份；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Ethnic Identity Performativity and Ethical Choices of Ilyas in Gurnah's Afterlives

Chunmei Fei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bdulrazak Gurnah's historical novel *Afterlives* depicts the harsh living conditions of ordinary people in Tanzania's Zanzibar region during the Anglo-German colonial period of the early to mid-20th centu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thical choices of Ilyas, the novel's implicit central figure, in his process of self-colonization under the call of Germany's "civilizing mission." It examines his adoption of an othered identity through abandoning his family to join African mercenary forces and immigrating to Germany, revealing the performativity of Ilyas' ethnic identity and his symbolic significance as an "absent presence" within the decentralized narrative chain.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act of colonial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n individual ethical choices while offering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Germany's cultural colonialist strategies in Africa.

Keywords: Gurnah; Ilyas; ethnic identity; ethical choices

引言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是英国籍坦桑尼亚裔作家，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20世纪60年代作为难民移居英国，20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来世》（*Afterlives*）是古尔纳2020年新作，描述和记录普通小人物在19世纪末德国建立东非公司到20世纪60年代坦噶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某种程度上，《来世》是对东非德国殖民历史洪流中被湮没和边缘化的人物和历史进行的补充和重构。本文聚焦于小说隐性中心人物伊利亚斯在“德国文明使命”号召下自我殖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探讨他在德国文化殖民影响下离家出走，抛弃妹妹参加非洲雇佣军，及移民德国等一系列的他者认同过程，通过分析作品中以伊利亚斯为中心的故事、人物之间，以及社会中存在着的伦理关系及道德秩序，揭示伊利亚斯族裔身份的操演性，以及他作为“缺席的在场”在去中心化故事链条中的象征意义。被殖民国家现如今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殖民历史遗留，

为此更应该辩证地反思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策略，强化本土文化教育，发扬文化遗产，培养文化自信，维护非洲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

1 伊利亚斯的伦理选择——西方文明的应征者

20世纪初，东非地区在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争夺中民不聊生，《来世》书写的就是这一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东非海岸小镇，时间跨度八十多年，整部作品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古尔纳采用第三人称间接叙述和多重叙事视角的手法，从哈利法到伊利亚斯和阿菲娅，再从哈姆扎到其子小伊利亚斯，随着故事线不断向前推进，主要人物分别作为叙事的核心依次出现，缓缓讲述他们在殖民背景下艰难生存成长的故事。在这样的去中心化的叙事视角下，读者得以从小人物的视角去审视在殖民压迫下各人的选择，同时也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了东非桑给巴尔和坦桑尼亚地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间的政治图景和社会现状，以及德英殖民地争夺给本土人民带来的苦难。

全书共十五章，总体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二章主要以伊利亚斯为中心视角展开，从第三章起至第十四章，他作为“缺席的在场”，主要通过周围人物的回忆和思念间接呈现，直至小说尾声小伊利亚斯前往德国调查，才逐渐拼凑出伊利亚斯的生命归宿。年幼时因无法忍受家庭的贫穷和父母的疾病，年仅十一岁的伊利亚斯选择逃离他的穷乡僻壤，做出了离家出走这一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第一个重大伦理选择。在离家流浪路途中，伊利亚斯又辗转被德国殖民驻防军阿斯卡利诱，拐到山里的一片德国咖啡农场。此后，他在农场度过了九年的快乐时光，在伊利亚斯眼中，农场主心地善良，关怀工人，是如父亲一般的存在。农场主将他送进教会学校接受殖民教育，后又推荐他到沿海城镇一家大型德国剑麻庄园工作，他也因此结识了小说另一关键人物哈利法，并很快与其成为互帮互助的挚友。在哈利法的鼓励下，伊利亚斯决定回老家探亲。在思想认知和宗教选择上，说着一口流利德语的伊利亚斯俨然已经完全西化，完全背弃了伊斯兰教的一切教理习俗，向往德国现代文明，推崇德国现代医学。回乡探亲途中，借住在哈利法好友卡里姆家中时，面对卡里姆一起做穆斯林昏礼的邀约，伊利亚斯表现得手足无措，十多年来，他从未进过清真寺，不知道怎么祷告，更不知道祈祷词。他对卡里姆家破败的房屋的嫌弃、对搭乘同乡车夫的鄙夷态度彰显着他高人一等的认知。历经几天的奔波，伊利亚斯终于从沿海小镇回到大山里的家乡，却发现父母早已去世，妹妹阿菲娅被寄养在隔壁村没有亲缘关系的叔叔家，他决定将妹妹接回自己身边生活。在受尽虐待的妹妹阿菲娅眼中，哥哥伊利亚斯就是她黑暗生活的救赎，初次见面时哥哥伟岸儒雅的形象永远刻入阿菲娅的脑海里。她跟随哥哥来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大海，其后，伊利亚斯也是全身心陪伴阿菲娅，教她读书写字，讲述他在德国农场的的生活，字里行间传递出他为自己所受的德式教育和信奉的基督教的自豪之情。

然而，这样简单平淡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年后，德英两国为夺取殖民地爆发战争，伊利亚斯做出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第二个伦理选择——义无反顾地自愿加入德国驻防军“阿斯卡利”，在拥护德国殖民统治与照顾唯一的亲人面前，伊利亚斯选择了前者。他放弃了在剑麻厂的文书工作，再次将才感受到亲情温暖的阿菲娅送回乡下叔叔的魔爪，告别好友，踏上军途，此后，伊利亚斯杳无音信。哈利法作为伊利亚斯的好友，在得知阿菲娅再次被虐待至打断手后，将其解救带回沿海小镇，收养为养女。长大后的阿菲娅与参军后返乡寄宿在哈利法家的哈姆扎结婚，以哥哥伊利亚斯的名字为他们的孩子命名，饱含着阿菲娅对哥哥的思念。在全书末章，我们才得知伊利亚斯所做出的第三个伦理选择——移民德国，成为西方文明的应征者。成年后的小伊利亚斯遍访德国档案馆，在档案搜寻、鉴别和重审中拼贴出舅舅伊利亚斯移民德国后的经历，努力以此勾画家族历史：心怀对“德国文明”向往的伊利亚斯在战争结束后移民德国，并改名埃利亚斯·埃森，在汉堡以卖唱营生，与一名德国女子结婚，并育有3个孩子，参与纳粹组织的帝国殖民联盟，后来因违反纳粹种族法、玷污雅利安女子被捕，死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2 旁观者的透视——伊利亚斯的身份操演

古尔纳曾在采访中坦言“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一直对人们解决‘身份’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一直在探索人们如何重塑自己、改造自己”，在《来世》中，伊利亚斯的身份问题就是一个关键且富有深意的支线。有关身份的操演性可以应用到对族裔身份的研究中，种族身份操演侧重关注不同情境下有色人种个体与群体的身份认同。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操演分为主动与被动，主动的操演指涉对既有身份的颠覆，通过对伊利亚斯在人生进程中离家出走，参加非洲雇佣军，到移民德国的一系列伦理选择，可以清晰地看到伊利亚斯对自己种族身份的主动操演，他的身份建构过程不是为了抵制，而是为了融入主流社会霸权，重构自我种族身份。黑人身份操演突出黑人并非天生低人一等；黑人能在一定环境中操演白人身份，甚至可以建构新的黑人身份，这种文化身份的操演性使操演者通过特定的行为来获取对某一团体或某种文化的归属感，伊利亚斯作为非洲殖民地被殖民族群弱者的存在，正是通过操演德国强者文化的行为规范以跻身向往的德国社会。

童年时代贫困的家庭与德国农场悠闲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由落差产生的自卑感不断内化的结果就是被殖民的黑人投射出一个“自我殖民”的他者形象。面对他人对德国殖民者罪恶行径的揭露，伊利亚斯选择了坚决的否定：“你们根本没听说过那些人对德国人都做了些什么。德国人必须用残酷手段去反击，只有这样，才能让野蛮人明白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服从。德国人是值得敬佩的文明人，自从来到这里，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伊利亚斯只看见夸大其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正面效应，却忽视杀戮和饥饿的反面，为殖民主义辩护，为此如仰视高等文明一样仰视德国人，不惜加入阿斯卡利镇压自己的人民，试图借此重置自己的身份，或许这也是伊利亚斯逃离非洲在德国领地生活九年而从未想过返乡的原因。

整篇小说除了开头，一直都只有伊利亚斯经历的空白，但伊利亚斯对所有小说人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始终是所有人牵挂的对象，而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寄希望去填补这段未知的人生。小伊利亚斯的命名，饱含妹妹阿菲娅对哥哥的纪念，如何在一个破碎的年代寻找一个身份限制重重的人，长大的小伊利亚斯为了这一家族夙愿，踏上了德国的土地。“他去过帝国殖民联盟的档案管理处，去过弗赖堡的军事历史研究所，去过柏林的殖民地联盟档案馆，还去过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走访了学院的语言学家，查阅了学院对管理已收复殖民地的警察和政府官员进行语言培训的文献档案……就这样，他逐渐勾勒出一个草图，一段故事”。在德国战败后，伊利亚斯漂洋过海来到德国，移民德国后，伊利亚斯却面临着新的身份建构危机：在德国社会遭受种族歧视，为德国殖民战争卖命的异乡人伊利亚斯没能成功申领抚恤金和功勋奖章，但他却再次参与德国纳粹组织帝国殖民联盟，为再殖民化运动摇旗呐喊，最后因种族法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历史叙事通过德国

官方档案对伊利亚斯身份的扭曲,揭示了非洲人在德国社会“黑人他者”的身份困境。伊利亚斯在德国的悲惨遭遇揭示了他在殖民教育生产出的失去本土文化之根的模仿者身份,以及最后身份操演的失败。《黑皮肤,白面具》中,以心理分析方式揭示了伊利亚斯这一自我殖民、自我他者化的过程:强大的殖民文化和殖民机器把黑人置于“变成白人或者消失”的进退两难的地位,从而使得被殖民者产生了所谓的“从属情结”,并最终“自我奴隶制化”。“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肤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

3 德国非洲文化殖民主义策略的深刻反思

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西方文化将自身持续“合法化”、将殖民地本土文化贬斥为虚无的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科技成果与传播优势,打造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宣扬本国的经济物质成果与政治制度优势,不断削弱第三世界的国家主权意识和民族文化精神,推动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新型文化殖民,形成了一种将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信息化优势融合的一种新型文化体系与话语霸权。德国以其政治、经济、军事霸权为基础而逐渐推行的文化使命,是一种扭曲的强势压迫性文化。德国的殖民文化持续作用于非洲人民的民族心理、民族潜意识,意图压制被殖民者民族文化,使其整体转型。伊利亚斯就是德国文化殖民的成功案例,他对德国以及德国人产生极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在此影响下做出了一系列改变他人人生轨迹的伦理选择。

非洲经历了漫长的殖民史,正如阿杜·博亨(Albert Adu Boahen)所言,“非洲历史上从未像1880到1935年之间那样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而且变化如此迅疾”。19世纪20年代,英德分别对东非进行殖民渗透,逐渐划定了双方在东非的势力范围,并于1890年完成了对东非的瓜分。其后,德国在东非大举扩张,使德属东非迅速扩大到近100万平方公里,成为德国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1884年,德国殖民主义者卡尔·彼得斯等人为掠夺非洲资源成立德国东非公司,对东非进行殖民。然而,1905年,在金吉基蒂莱·恩瓜莱的领导下,德属东非爆发了大规模反抗殖民统治的马及马及起义,起义迅速席卷德属东非南部地区,1907年,德国通过饥荒等残酷手段将起义镇压。马及马及起义严重打击了德国的殖民统治,迫使德国采取温和手段管理德属东非,德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以血腥的暴力和强权来实行殖民统治的殖民方法只会带来殖民地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而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文化殖民统治成为了侵略渗透以达到控制的有效手段,从而德国开始将暴力机器的现实直接统治转变为更为温和和隐晦的文化领导权。德国殖民者开始在文化领域持续传播德国文学与宗教,并将其侵略与殖民包装成一种崇高的“德国文化使命”(Zivilisierungsmision),以期达成更长远文化心理控制与意识形态控制。

伊利亚斯人生历程中遇见的殖民者不乏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肩负为“野蛮人”带来“文明进步”的使命。西方宗主国秉持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致力于把三C“商业

(commerce)、基督教(Christianity)、文明(civilization)”散播非洲大地,德国路德教传教士指着夕阳下非洲的景色对哈姆扎说:“你知道,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发生过任何重要的事情……这片土地在人类成就史上无足轻重。你可以从人类历史上撕下这一页,且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任何影响。”。这俨然是德国殖民者对非洲灿烂的历史文明、东非桑给巴尔地区两千多年的历史,及其在跨区域跨大陆的商业贸易中的角色一无所知。大量诊所的建立和学校的创办,的确使德国殖民者在医学与教育上为非洲大地带来了进步,殖民扩张也迫使某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被动地进入了现代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一些“现代化”效应,但这并不代表可以从道德上为殖民主义进行辩护,用文明修饰的残暴正是西方军国主义国家文化殖民主义的实质。殖民主义的遗绪更是引发了种族规范和文化霸权的身份操演,削弱了边缘群体的自尊,并催生了自卑情绪,使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应有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还面临着丧失文化自主性的风险。宗主国推行的文化殖民策略导致了殖民地居民对本土文化价值的异化,将宗主国的文化价值观变为他们自己的,这一文化同化过程,对个体及社群的文化认同构成了深刻影响,亟需我们进行批判性反思。

4 结语

大时代与小人物,东非大陆与海滨小城,碰撞出一曲夹杂着痛苦与喜悦、平凡与起伏的歌谣,伊利亚斯的一生都是身份认同的悲剧,他是一个非洲的小小缩影。古尔纳将一众小人物的命运置于20世纪初期到中期的殖民统治与战争的大场景中,以及德、英依次角逐带给本土人民的苦难岁月,将个人的命运与广阔的历史背景相交织,突显殖民历史和边缘政治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展现了非洲大陆人民在殖民主义和民族运动冲击下的生活真实情况,关注历史事件中的个人情感和生活状态,以及历史过程中的差异、矛盾和碎片性,不过分强调苦难,更多探讨人物内心,展现人物在困境中的坚韧和希望,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殖民写作的历史视角,也提供了对非洲移民问题的新视角。

【参考文献】

- [1]余静远.“这片土地在人类成就史上无足轻重”——论古尔纳新作《来世》中的历史书写[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2):18-29.
- [2]弗朗茨·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28.
- [3]王健会.种族操演性——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研究[J].国外文学,2014(3):7.
-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1.
- [5]Gurnah, Abdulrazak. An Idea of the Past[J]. Moving Worlds: A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Writings,2002(2):6-41.

作者简介:

费春梅(1999-),女,汉族,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族裔文学。